

陈景磐 主编

中國近現代教育家傳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

陈景磐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

陈景磐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534千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统一书号:7243·449 定价:2.85元

前 言

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1840年到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进程极其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错综复杂而激烈的斗争。

这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了近现代中国二十多位著名教育家的生平、教育实践活动、教育思想和主要教育论著。全书以“介”为主，寓评于“介”，史料翔实，观点鲜明，颇有发人深思的见地。

通过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家的介绍和评述，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清晰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轮廓、实质及其在斗争中曲折前进的轨迹和发展的规律。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日益沦为受欺凌、受侮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然而，中华民族是决不甘于落后挨打的。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思辨和卓绝的探索。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教育领域，充满了学校与科举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资产阶级新学与封建主义旧学之争。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他们的教育家都曾提出过种种改革旧教育的主张。尽管他们的立场和目的各不相同，但在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起过或多或少的进步作用。然而，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封建主义顽固势力的勾结下，在中国大地上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教育，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它不同于完全的封建教育，也不

同于由帝国主义完全统治的殖民地教育。这种教育不由自主地在客观上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就这一点说，它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但这种教育又不同于真正的资本主义新教育，它不仅依然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而且含有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这种教育，是受到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和封建主义的重重束缚而畸形发展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的问世，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教育领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教育，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进行了反复的较量。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忠诚于民众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他们为发展民族民主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读者将从本书翔实生动的记叙中，深切地感受到我国近现代史上优秀教育家们为振兴祖国、报效人民而兴学育才的爱国热忱和赤胆忠诚。他们的爱国主义崇高品德使我们感动不已，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办学的创业精神使我们深受启迪，他们为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光辉事迹使我们深受鼓舞。所有这一切，都将极大地激励我们立志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终身。

现在教育史这门学科，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似乎都偏重于教育家教育理论方面的论述，而对他们的教育实践，尤其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则往往注意不够。须知，一个教师如果缺少这种精神，不论他学了多少教育理论，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往往是在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教育实践中，才总结提炼出许多合乎客观规律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教育理论知识不重要，完全不是，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指导学生学习教育理论，掌握教育规律，使他们在从事教

育工作时少走一些弯路；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这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如能在这方面给读者以感染和教益，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曾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教育遗产。同样，在可歌可泣的近现代史上，教育家们也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其中不少是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原则和方法。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和前天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历史现象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正确认识、掌握和运用教育规律，我们必须对教育史进行研究，而不应割断历史。察古可以知今，继往为了开来。不加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当然是要不得的，而全盘否定历史遗产则更是荒谬的。批判是手段，继承、开拓和前进才是目的，如同沙里淘金一样。探索和研究历史（包括教育史）的意义和真谛正在于此。温故而知新。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就不难在历史遗产中找到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的东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这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撰稿的作者，大多是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中年学者。他们既善于继承，虚怀若谷地吸取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又对史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潜心的钻研，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难能可贵的治学态度，是令人十分高兴的。这正是教育史学界的生命之所在，希望和未来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远远不止本书收入的这二十几位，其他的教育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再则，本书出于众人之手，各人情况不一，因此写起来篇幅参差不齐，风格各具异彩，似乎也难以强求一律。

可以相信，这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的出版，将会有助于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的师生坚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推动

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 and 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景磐

1986年，北京

目 录

龚自珍	高 奇 (1)
魏 源	高 奇 (7)
容 闳	蔡振生 (15)
<u>张之洞</u>	吕 达 (31)
张 謇	苏渭昌 (63)
严 复	张志建 (88)
康有为	张志建 (106)
蔡元培	高 奇 (126)
章太炎	易慧清 (151)
梁启超	何晓夏 (173)
陈嘉庚	邱 瑾 (194)
张伯苓	高 奇 (214)
徐特立	吴永湄 (225)
黄炎培	高 奇 (252)
吴玉章	雷克啸 (268)
鲁 迅	顾明远 (285)
林砺儒	苏渭昌 (301)
李大钊	何晓夏 (325)
<u>陶行知</u>	郭 笙 (337)
<u>陈鹤琴</u>	陈秀云、蔡怡曾 (372)
杨贤江	何晓夏 (397)
恽代英	苏渭昌 (419)

龚自珍

高 奇

龚自珍（1792～1841），字璩人，号定庵。一名巩祚，又名易简，字伯定。浙江省仁和（今杭州）人。近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诗人，鸦片战争之际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吏的家庭。其父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江苏按察使。

龚自珍少年时期从外祖父，著名乾嘉学派学者段玉裁研读经学、金石学和训诂学。1810年十九岁时应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1812年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这时清王朝国势衰微，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爆发。1796年到1804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波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1813年，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义，陕西岐山县木工起义。1814年，河南捻军起义。鉴于社会危机严重，龚自珍不甘心埋首于考据学，开始研讨经世之务。1814年作《明良论》，1816年作《乙丙之际著议》和《平均篇》。

在这些著述中，龚自珍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看到清王朝已经步入风雨飘摇的“衰世”，如同“未雨之鸟，威于飘摇；痹癆之疾，殆于痼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①。他震惊于农民起义，预感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将要来临。他写道：“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

^①《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人为之波涛”^①。他看到土地兼并的严重后果，使“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指出：“贫富不均则不平之气郁”，而“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所以“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②。他大胆地提出“更法”的思想，主张不要拘“一祖之成法，惮千夫之议”，认为：在此“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情况下不改革是不行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③在诸多弊政之中，龚自珍认为教育之不良，吏治的腐败是当时的要害问题。

龚自珍根据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所以治学应以研究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讲求当代的实际问题为主。可是现实的情况怎样呢？“在朝者自咏其祖宗之遗法，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甚至比这样的衰世还不如。师儒们都是：“生不荷耒耨，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以致国家空有“养士之资”，而“士无报国之日”^④。及其作官之后，“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⑤。甚至只知探听皇帝之喜怒，蒙色笑。得赏就扬扬以喜，出门夸耀于人；小不谄，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可以受眷之法，这种人怎么能管理国家更法求治呢？年青的龚自珍在思索探求改革之途。

1818年龚自珍二十七岁应浙江乡试中第四名举人。次年应会

①《尊隐》，《全集》，第88页。

②《平均篇》，《全集》，第78页。

③《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全集》，第6页。

④《乙丙之际著议第六》，《全集》，第5页。

⑤《明良论》，《全集》第32页。

试不中，留在京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又与常州学派宋翔凤结识，接受了今文经学派的观点、方法，大明微言大义之学；后又学佛。1820年再次应会试下第，就内阁中书职。

1821年龚自珍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时馆中方修《统一志》，他负责校对青海、西藏各图。从此，他开始抛开经史，从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①，尤其重视研究西北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等等，留心少数民族问题，边防、海防问题。他的《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等著述，主张移民实边，既解决无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又可以巩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的侵略。这时他自称无暇去考证易、书、诗、春秋等经，而是“读百家之书，好杂家之言”^②。他推崇陆若彥著的书包括“种树方”、“种菜方”、“种药方”三部分，为之作序；赞赏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中详载山川形势，人民俗，古迹今状并问民生之疾苦，讨军实之有无；认为《河工器具图说》是古今奇书，天下有用之书。他力主讲求实学，强烈要求把文化教育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考据性理词章中解放出来。1825年他写了著名的《咏史》诗，表达了这个思想。诗中说：“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③

龚自珍还作了《侑神之乐歌》，讽刺理学家是“坐谭(谈)性命，其语暗”，“暗断断，其徒百千”，“何施于家邦”？^④他抨击考据学“琐碎短钉”^⑤，科举以八股取士是使学生“疲精神

①②《古史钩沉论三》《全集》，第25页。

③《全集》，第471页。

④《全集》，第484页。

⑤《与江子屏笺》，《全集》，第347页。

耗日力于无用之学”^①，已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②。所以他在1829年应廷试对策时，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建议皇帝改革教育和选拔用人之道。他写道：“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材任之”，皇帝虽然圣明，但无辅佐不行；现在“教之、使之，又非其道，疲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进身之始，言不由衷，及其既进也，使一旦尽弃其所为，而骤责以兵刑、钱谷之事；而兵刑、钱谷之事又杂而投之一身。之人也，少壮之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已，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③。用这种办法怎么可能得人才呢？

龚自珍主张对儿童的教学要废除八股文改为“讽书”、“射策”。射策要策问本朝之事。他认为，说经、诗赋，无病呻吟、敷衍成事的文章，都不要用来大廷试士。龚自珍本人即深受科举以楷法取士之害。尽管他对边防问题很有研究和见地，朝考时对策的题目又是“安边绥远疏”，列举时事，洒洒千言，使阅卷诸公皆大惊；可是终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由于这个缘故，他三次殿试不中，不得入翰林。中进士后只能终身作内阁中书之类的小官。龚自珍于1829年仍复内阁中书职，1835年调任宗人府主事。1837年改任礼部主事。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干禄新书》加以讽刺。

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敏锐地预感到西方侵略者入侵的危险。他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蠶国”^④。1839年12月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他痛斥英国

①③《对策》，《全集》，第116页。

②《与人笺·拟厘正五事书》，《全集》，第344页。

④《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全集》，第229页。

以鸦片烟毒害和侵略中国的行径，激励林则徐坚决禁烟，对侵略者要修整军器，加强备御。龚自珍满怀爱国热情，要求改革教育，冲破牢笼，培养出“上指天下画地”、“论议军国”、“臧否政事”^①，有治国整军本领的人。但这些当然不会被腐朽的清政府所容纳。他一生只能是“冷署闲曹”，然而又“才高动触时忌”^②，最后不得不于1839年辞官投笔出都。他的己亥杂诗，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③。他在南归的路上，写下了不朽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④号召人们冲破万马齐瘖的死沉局面，挣脱旧教育的束缚。也就在这一年，他写了《病梅馆记》，来阐发他的教育理想。

《病梅馆记》是一篇寓言性的讽刺文。龚自珍把清统治者顽固派比作赏花的“清贵”，把施教者比作“养花人”。为了迎合清贵们的爱好，养花人把长得好好的梅花捆绑起来，“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强使梅花按照某种格式生长，变得歪歪扭扭，奇形怪状。他买了三百盆，无一不是这种病态。于是他“泣之三日”，发誓治疗，辟病梅馆以贮之，将这些梅花解去桎梏，毁掉花盆，埋于地下，让梅花自由生长，“以五年为期，必复全之”^⑤。龚自珍可以说是我国较早提出自然教育和自由教育思想的人。

1841年龚自珍就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后又主紫阳书院兼丹阳书院讲席。七月至丹阳，但不幸于八月十二日得暴疾逝世，时年

①《京师乐籍说》，《全集》，第118页。

②《定庵先生年谱》，《全集》，第622页。

③④《己亥杂诗》，《全集》，第521页。

⑤《病梅馆记》，《全集》，第186页。

仅五十岁。

龚自珍主要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但他的思想却影响了鸦片战争后的一代人。有人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年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②。龚自珍是一个开风气、呼风唤雨的人物，但他不是风雨的本身；他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材，但新的“格”是什么，他还未能提出，而他的好友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后提出来了。

①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

②《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20年版，第54页。

魏 源

高 奇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父魏邦鲁作过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在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所以自幼从母读书，“母绩子读，欣欣忘贫”^①。1808年十五岁时，补县学员子弟，研究阳明之学，好读史。1810年十七岁时就开始授徒。1812年应试之前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1814年随父至北京，从胡墨莊习汉儒家法，又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学公羊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等切磋古文辞。这一时期从各名家的学习，奠定了他一生学术思想的基础。魏源在京时授馆，三年后归湖南在长沙授徒。

魏源在北上途中，经湖北、江苏、河南、河北等省，沿途见到灾荒严重，饥民遍野，深有所感。他用诗描述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凄惨情景：“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以鸠止渴饥，僵者乱如麻”；“野风吹蓬蒿，蒿中瓜庐垣；冽冽井不食，寥寥突无烟”^②。他对晚清经济衰败的忧虑，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是他以后留意于经济之学，注意研究海运、水利、盐务等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1822年二十九岁的魏源中顺天乡试举人。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魏源为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从此魏源留意于经世济用之学。《皇朝经世文编》开汇集研讨时务和政论之文的先声，以后编辑这类文编成为一种风气。1829年，三十六岁的魏源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他自己说：“内阁为典籍之藏，国朝掌故

①《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47页。

②李瑚著：《魏源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页。

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学”^①。

魏源在治经史之学中，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要通过“习”与“行”才能获得知识。他说：“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②可见必须是“‘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③他认为“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见；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④。所以，“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魏源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⑥。因此，不可以“执古以绳今”，而如果以古代的一切作为准绳来衡量当前的事物，“是为诬今”；也不可“执今以律古”，否则就是“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⑦。据此，魏源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思想，并认为已经变化了、前进了的事物，是不会再倒退回来的。“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⑧从这种唯物的讲求实际的思想出发，魏源认为，治理国家者必需考虑现实的民情和人心之向背。他说：“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

①《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第848页。

②《默觚上·学篇三》，同上书，第9页。

③《默觚下·学篇二》，同上书，第7页。

④⑤《默觚下·治篇一》，同上书，第35页。

⑥⑦《默觚下·治篇五》，同上书，第47、48页。

⑧《默觚下·治篇五》同上书，第48页。

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羸，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①。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②。发展的观点使他的思想与时俱进，成为我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一，也构成了他主张改革时弊、革新教育的思想基础。

魏源认为学习必须有济于实用，能解决现实问题，而死守书本不能谓之学。“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剽袭者不可与言文”。“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就是“庸儒”^③。他抨击当时的教育：讲性理之学的“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防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④搞考据之学的则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如国家何？”^⑤他批评当时的读书人不重农桑，以农桑为俗务，这种人只能是无用之“腐儒”。“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短订可为圣学乎？释志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⑥魏源特别不满于当时“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教育内容、科举和用人制度。他说：“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

①《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第44页。

②③《默觚·治篇五》同上书，第48、49页。

④《默觚下·治篇一》同上书，第36页。

⑤《默觚上·学篇九》，同上书，第24页。

⑥《默觚下·治篇一》，同上书，第36页。